

doi:10.19920/j.cnki.jmsc.2025.12.001

行政垄断规制、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创新^①

——基于执法案件的经验证据

陈熠辉¹, 韦皓元², 蔡庆丰³

(1.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长沙 410006; 2.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深圳 518055;
3.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厦门 361001)

摘要:破除行政垄断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本文从法治的视角,基于行政垄断相关的执法案件,采用2007年—2016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探究行政垄断规制、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执法实践的行政垄断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机制检验表明,行政垄断规制主要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两条渠道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企业创新水平上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行业领导者、非国有企业、地区司法透明度较高和地区本身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本文的研究表明行政垄断规制也有助于促进僵尸企业出清和激发地区的创业活力。本研究对于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行政垄断规制; 企业创新; 竞争效应; 寻租管控; 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25)12-0001-15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在新发展阶段,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想要实现这一过程,必须不断完善各种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激发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着力破除阻碍市场运行的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化因素。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失衡和区域经济竞争,导致地方行政机关和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政垄断行为盛行,也带来了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对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成根本性障碍^[1]。一方面,地

方行政垄断限制了资源要素的流动,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2];另一方面,行政垄断通过公共权利垄断市场妨碍公平竞争,使得市场竞争机制无法有效发挥^[3]。行政垄断使市场运行规则屈从于行政干预,带来市场机制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的问题,一直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痼疾。中国的行政垄断经过多年的积淀,政商关系错综复杂,渗透到国民经济的众多行业 and 部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具有更为广泛且恶劣的影响,是当前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行政垄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提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法治既是市场经

① 收稿日期: 2024-11-19; 修订日期: 2025-04-2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基金项目(7230208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大项目(23&ZD079);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2023JJ40184)。

作者简介: 陈熠辉(1992—), 男, 江西赣州人,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Email: chen_yihui1992@163.com

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中国政府也不断出台和完善相关制度、法律,致力于通过法治手段规制行政垄断。尤其是在 2022 年 6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律地位,为法律层面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依据。相关的执法实践也在清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些年我国通过法治手段广泛开展的行政垄断规制实践,对市场建设和经济发展形成积极影响,并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但是对于行政垄断规制实践所带来的具体经济影响,尤其是从严谨的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其对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而到微观企业发展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尝试从行政垄断执法的视角,深入探究行政垄断规制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为当前中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与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经验借鉴。

企业作为市场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高度依赖所处市场环境。创新不仅是企业维持核心竞争力、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支柱。现有研究指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常会扭曲竞争、引发资源错配,进而抑制企业创新^[4-6];而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充分的环境则更有利于创新涌现。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激发竞争活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关键路径。在这一背景下,行政垄断规制深刻塑造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并影响其创新决策。一方面,规制措施有助于清除制度性壁垒,构建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抑制无序与过度竞争,从而强化市场机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引导作用,激励企业依靠创新能力保持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行政垄断规制能够打破地区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低效干预与偏向性扶持,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以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当前,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与国内外多重挑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是推动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在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厘清政府

与市场关系,构建能够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已成为保障我国创新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制度基础。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从执法实践的视角深入探究中国的行政垄断规制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创新决策,为法律层面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依据。本文以 2007 年—2016 年的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依据地方的行政垄断执法案件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多时点 DID 模型,对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在经历过行政垄断执法案件冲击之后,域内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得到显著提升,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从规制成效上来看,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对于行业领导者、非国有企业、地区司法透明度较高和地区本身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的样本更为明显。同时,本文从市场竞争机制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两个渠道理清了行政垄断规制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最后,本文的研究也表明,行政垄断规制不仅能够促进微观企业创新,也有助于促进僵尸企业出清和激发创业活力,进一步验证了行政垄断规制带来的市场建设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 从行政垄断规制的视角拓展了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微观企业发展领域的研究。已有文献对如何有效规制行政垄断及其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关注有限,尤其缺乏基于执法实践的经验分析。在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下,破除行政垄断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支撑。近年来的执法实践为识别行政垄断的经济效应提供了良好场景,本文由此切入,系统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填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2) 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既有研究多从城市化、产业政策、税收环境等角度探讨市场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6,7],而基于行政垄断视角的分析尚不充分。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了“行政垄断规制—统一大市场建设—企业创新”的整体分析框架,为中国情境下政府行为、市场环境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理支持;3) 为新发展阶段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微观企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面对人口红利减弱、逆全球化与国际形势动荡等多重挑战,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内需拉动增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行政垄断是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制度障碍。本文基于行政垄断规制的实践证据,系统分析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理论机制与假设提出

创新活动对于微观企业而言,是获取市场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推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8]。然而,企业的创新活动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市场环境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竞争较为激烈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地区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6,9-11]。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促进资源要素流通、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减少企业创新要素错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而从行政垄断与统一大市场的关系来看,行政垄断规制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执法手段规制行政垄断能够有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行政垄断规制通过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逻辑,构建整体的分析框架:

第一,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减弱市场分割、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现有研究表明,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能够有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12-14]。这主要源自竞争性市场能够通过优胜劣汰机制淘汰低效企业、吸引高效率企业,促使企业为了保持市场份额,提升竞争力,不得不通过增强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而在垄断性市场中,较弱的生存威胁会使关联企业形成“垄断者惰性”,导致关联企业更倾向于保守的经营策略,寻求短期的利益和稳定的市场地位,而忽视了长期的创新投入和发展。此外,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和生存挑战,这些企业可能陷入舒适区,缺乏创新的紧迫感和动力,导致对高投入、高风险和长周期的创新活动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投入。行政垄断规制

能够使得区域内的垄断势力和妨碍市场竞争的机制体制得到有效清除,进而通过吸引外地企业进入和新创企业成立强化市场竞争机制^[5]。在这样的环境中,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维持竞争优势和规避市场淘汰的关键因素,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往往会因市场的“被动选择效应”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根据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这种压力会转化为创新动力,促使企业通过研发创新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同时,竞争环境的改善也提高了创新活动的预期回报,使企业的研发决策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此外,竞争性市场的建立促进了企业间的技术模仿和学习,加速了创新成果的传播^[15]。同时,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打破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的桎梏^[16],充分竞争带来的“干中学”效应,能够降低后续创新的边际成本,产生创新活动的规模报酬递增^[17]。因此,行政垄断规制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

第二,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创新。与其他投资活动相比,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投入大等特点,使其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因此,稳定的现金流和政策支持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至关重要^[18]。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减少政府干预和清除市场壁垒,加速资源要素流通和市场有效运行,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其一,行政垄断规制可以从源头上规范政府机构的行为,不仅降低了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也能够清除行政垄断相关企业的政府隐性担保,政策资源和金融资源的配置遵循更加市场化的原则,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企业实际经营质量和盈利能力配置信贷资源。统一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使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能够按照边际产出原则自由流动。这种要素再配置过程会产生两个积极效应:一方面将资源从低效企业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使高效率创新主体获得更多资源支持。因此,行政垄断规制会促使地区内的金融资源配置逐渐回归正常的市场秩序,非行政垄断相关企业所获取的政策资源和金融资源均会上升,能够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有效支撑。其二,行政垄断滋生的寻租行为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企业将资源从研发转向政治寻租(如游说政府获取特权),降低整体创新效率^[19,20]。通过执

法手段规制行政垄断,不仅能减少寻租行为,还能降低非寻租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提高违法和寻租的成本,有效震慑潜在的行政垄断和其他扰乱市场的行为,优化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增加创新投入^[21].其三,于良春和付强^[22]指出,行政垄断还会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效率,不仅引发技术进步的假象,还会导致国民经济持续依赖于低效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行政垄断规制会促进资源要素和技术成果的广泛流动^[23],通过发挥我国超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为各种创新要素通过集聚与交流形成知识溢出、技术扩散等创新外溢效应提供了可能,也为营造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创新保护等高质量的创新环境提供了制度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起到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的作用,相应地企业创新水平也会提升.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而提升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水平.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在数据选取方面,选取 2007 年—2016 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为样本.考虑到原始的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可能存在填写错误、数据指标以及部分数据样本前后识别不匹配等问题.参考范子英和王倩^[24]的做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统一样本期间内企业的纳税号、行业和所属地区信息.同时,本文也删除了利润总额大于营业收入、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以及成本费用率、固定资产比率小于 0 等存在明显登记错误或者不符合会计准则的异常样本.此外,为了避免极端值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涉及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3 257 665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

本文的重点数据为各地区发生的行政垄断相关处罚案件信息.行政垄断案件相关数据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各

级行政单位的各类行政处罚记录进行收集整理.此外,本文采用的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

2.2 变量定义

2.2.1 因变量

参考黎文靖和郑曼妮^[25]和陈熠辉等^[7]的做法,采用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的度量指标.为了缓解专利数据存在的右偏问题,本文以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创新数量(*Patent*)的代理变量.同时,将企业的专利申请分为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申请数(*Ipatent*)与非发明专利申请数(*Nipatent*)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2.2.2 自变量

企业受到行政垄断案件冲击的影响,具体为企业所在城市在发生第一起行政垄断案之后取值为 1,反之则为 0.

2.2.3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文献^[7, 26],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 *Size* 为企业总资产取对数;2) *Cash* 为企业现金持有量除以总资产;3) *Fixed* 为企业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4) *Lev* 为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5) *ROA* 为企业资产收益率;6) *ATO* 为总资产周转率;7) *INV* 为企业存货占比;8) *Tax* 为企业应纳税额的对数值;9) *Gdpp* 为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均 GDP;10) *Loan* 为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11) *Sia* 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12) *Market* 是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占比.

2.3 实证模型

本文实证采用多时点 DID 模型进行分析,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Innovation_{i,j,t} = \alpha + \beta BAM_{i,j,t-1} + \theta Control_{i,j,t-1} + u_i + z_{jm} + \varepsilon_{ij} \quad (1)$$

式中 $Innovation_{i,j,t}$ 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代理变量,以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总数进行度量. $BAM_{i,j,t-1}$ 是自变量,如果企业所在城市 j 在 $t-1$ 年出现行政垄断案件,则第 t 年及之后年份均取值为 1,反之则为 0. $Control_{i,j,t-1}$ 为包含一系列滞后一期的企业和地区层面控制变量.此外, u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z_{jm} 为年度和行业交乘固定效应, ε_{ij}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回归的标准误均聚类至城市层面.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1 列示了地区行政垄断规制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1 列(1)~列(3)为在控制相关固定效应之后只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的结果,而表 1 列(4)~列(6)为进一步加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 由表 1 列(1)、列(4)的结果可知,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企业专利总数 (*Patent*) 时,核心自变量 *BAM* 的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这一结果表

明,地区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的专利产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表 1 列(2)~列(3)和列(5)~列(6)中,进一步区分了企业不同类型专利申请的结果,分别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 (*Ipatent*) 和非发明专利申请数 (*Nipatent*) 的影响. 结果表明,地区的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的两类专利申请均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带来的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优化为企业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强劲的动力,进而起到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的作用. 综合来看,表 1 的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1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1)	(2)	(3)	(4)	(5)	(6)
	<i>Patent</i>	<i>Ipatent</i>	<i>Nipatent</i>	<i>Patent</i>	<i>Ipatent</i>	<i>Nipatent</i>
<i>BAM</i>	0.016 *** (8.818)	0.005 *** (4.515)	0.015 *** (9.468)	0.013 *** (7.148)	0.003 *** (2.794)	0.013 *** (8.178)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Firm</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 × Ind</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3 257 665	3 257 665	3 257 665	3 257 665	3 257 665	3 257 665
<i>R</i> ²	0.643	0.627	0.612	0.644	0.628	0.612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下的 *t* 值；***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1$ ；限于篇幅省略常数项和控制变量，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多时点 DID 估计的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保证 DID 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首先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以企业所在城市首次发生行政垄断案件的前一年作为基期,分别设置行政垄断案件的前 4 年(前 4 年之前的年份归并到前第 4 年)和后 4 年(4 年之后的年份归并到第 4 年)的虚拟变量,检验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动态效应.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到,在对行政垄断案件的执法活动之前 (*pre_4* ~ *pre_2*),所有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且没有明显的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表明在处理行政垄断案件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的创新产出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行政垄断案件发生之后 (*post_1* ~ *post_4*),时间虚拟变量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这也支持了 DID 的平行趋势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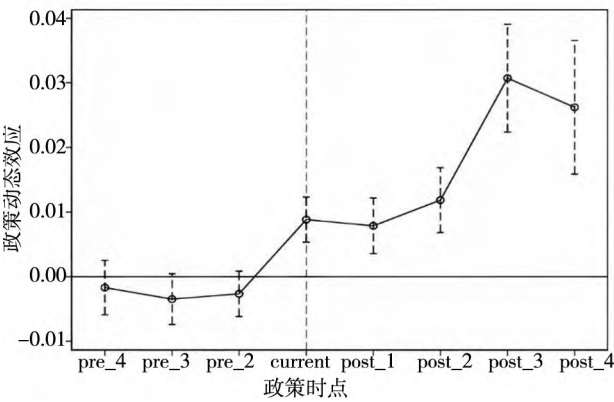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Fig. 1 Trend test for parallel lines

3.2.2 其他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1)安慰剂检验;2)采用 PSM-DID 法进行分析;3)使用 2010 年—2022 年上市公司样本重新回归;4)以企业所在城市累计处理的行政垄断

案件数加 1 取对数作为自变量重新估计;5)将自变量替换为是否发生行政垄断案件且主体受到经济处罚的虚拟变量进行估计;6)参考权小锋和尹洪英^[27]的方法,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赋予 3:2:1 的权重,构建加权专利指标并加 1 取对数作为因变量;7)将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分别滞后二期与滞后三期进行回归;8)在剔除国家垄断行业样本后重新检验。上述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原有结论^②。

3.3 机制检验

3.3.1 市场竞争机制

为检验行政垄断规制影响企业创新的市场竞争机制,本文首先从企业进入退出视角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标志是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行政垄断滋生的市场壁垒既限制外地企业进入,又阻碍低效本地企业退出。而行政垄断规制通过消除壁垒、推进市场一体化,可优化企业进入退出机制,吸引高效外地企业进入并淘汰本地低效企业,从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本文借鉴谢贞发等^[28]的方法,将成立三年以内、在 $t-1$ 期未出现而在第 t 期出现的企业界定为第 t 期新进入企业;将第 t 期存在而第 $t+1$ 期后未观测到的企业,视为第 t 期退出企业,并分别设置虚拟变量 *Enter* 和 *Exit*。表 2 列(1)和列(4)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自变量 *BAM* 均显著为正,表明行政垄断规制显著降低了市场壁垒,优化了企业进入退出机制。进一步,行政垄断规制削弱了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的庇护,

既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准入限制,也能加速低效国有企业出清。为此,分别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入退出行为的异质性影响。表 2 列(2)和列(3)显示,行政垄断规制显著抑制国有企业进入,同时提升非国有企业进入,这一反差印证了市场进入机制趋于优化。表 2 列(5)和列(6)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退出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突出。由此可见,行政垄断规制在推动缺乏竞争力的本地国有企业退出的同时,亦吸引了更多高效率企业进入。

本文也直接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采用以企业的营业收入构建的地区-行业层面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HHI*)并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越低。回归结果如表 2 第(7)列所示,自变量 *BAM* 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会促进市场竞争,产生明显的竞争效应。此外,本文也采用企业层面的勒纳指数(*Lerner*)来度量企业的市场竞争水平,具体计算公式为 $Lerner = (\text{营业收入} - \text{营业成本} - \text{销售费用} - \text{管理费用}) / \text{营业收入}$,该指标反映了企业销售产品价格与成本的偏离程度,指标值越大,企业的垄断势力越大,市场竞争越弱。回归结果如表 2 列(8)所示,核心自变量 *BAM*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有效降低了企业的垄断势力,促进了市场竞争,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市场竞争机制。

表 2 机制检验:市场竞争机制

Table 2 Mechanism testing: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变量	企业进入			企业退出			市场竞争指标	
	全样本	国企	非国企	全样本	国企	非国企	全样本	全样本
	(1)	(2)	(3)	(4)	(5)	(6)	(7)	(8)
	<i>Enter</i>	<i>Enter</i>	<i>Enter</i>	<i>Exit</i>	<i>Exit</i>	<i>Exit</i>	<i>HHI</i>	<i>Lerner</i>
<i>BAM</i>	0.053 *** (39.890)	-0.046 *** (-8.812)	0.053 *** (38.647)	0.009 *** (7.983)	0.038 *** (6.750)	0.009 *** (7.554)	-0.171 *** (-3.813)	-0.002 *** (-4.203)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Firm</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 × Ind</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3 257 665	204 021	3 022 907	3 257 665	204 021	3 022 907	3 257 665	1 850 534
<i>R</i> ²	0.531	0.631	0.529	0.391	0.402	0.394	0.748	0.710

② 限于篇幅,相关结果未列示,有需要者可向作者索要。

3.3.2 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行政垄断规制有利于克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减少企业的寻租行为,发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资源配置作用,在统一规则下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基于此,本文首先参考 Richardson^[29]的做法,采用过度投资水平来度量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指标 (*Inveff*) 越大则表明投资效率越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越低.以企业的投资效率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3 列(1)所示,自变量 *BAM*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能够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逻辑.

其次,本文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角度检验行政垄断规制影响企业创新的资源配置渠道,具体通过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融资成本两方面进行回归分析.参考周煜皓和张盛勇^[30]的研究,采用企业资金成本相对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衡量信贷错配,构建指标 *Fd* (企业利率与行业平均利率之比),其值越高表明错配程度越严重.同时,以利息支出与负债总额之比 (*Fc*) 度量企业融资成本.理论上,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抑制金融资源向部分企业过度集聚,提升信贷配置效率,从而降低其他企业的融资成本.表 3 列(2)和列(3)结果显示,*BAM* 对 *Fd* 与 *Fc*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

行政垄断规制不仅缓解了信贷错配,也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

再次,行政垄断规制亦可能提升政策资源配置效率.该规制可抑制地方政府对特定企业的政策倾斜,纠正资源配置扭曲,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参与竞争.政府补贴作为引导企业发展的常用手段,其有效性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6, 31].为此,本文构建行政垄断规制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检验行政垄断规制是否通过优化政策资源配置影响企业创新. *Subsidy* 为企业政府补贴额加 1 取对数.表 3 列(4)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变量 *Subsidy*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交互项 *Subsidy* × *BAM*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政垄断规制优化了政策资源配置,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最后,行政垄断规制还可通过直接清理与间接震慑抑制企业寻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释放更多资金用于创新.借鉴于博和王云芳^[32]的做法,以业务招待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Rent*) 度量企业寻租;参考王永进和冯笑^[33],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与财务费用之和占总资产比例 (*Cost*) 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表 3 列(5)和列(6)结果显示, *BAM* 对 *Rent* 与 *Cost* 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行政垄断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寻租行为并降低了制度性成本,缓解了这些支出对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产出提升.

表 3 机制检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Table 3 Mechanism testing: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变量	(1)	(2)	(3)	(4)	(5)	(6)
	<i>Inveff</i>	<i>Fd</i>	<i>Fc</i>	<i>Patent</i>	<i>Rents</i>	<i>Cost</i>
<i>BAM</i>	-0.934 *** (-6.357)	-0.028 *** (-8.503)	-0.001 *** (-7.939)	0.007 *** (2.938)	-0.005 *** (-4.958)	-0.499 *** (-46.461)
<i>Subsidy</i> × <i>BAM</i>				0.006 *** (7.007)		
<i>Subsidy</i>				0.007 *** (22.998)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Firm</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 <i>Ind</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749 464	2 253 028	2 379 784	2 214 409	3 059 155	2 486 756
<i>R</i> ²	0.463	0.467	0.608	0.662	0.778	0.687

3.4 异质性检验

3.4.1 企业市场地位差异

企业市场地位可分为领导者与追随者,两者

在面临行政垄断规制时会采取不同的创新策略.通常,行业领导者更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原因在于:其一,领导者凭借市场势力与规模占据更多资

源,强化竞争之后可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从而迫使其通过研发维持领先;其二,领导者资源配置与风险承受能力更强,能高效推进研发并借助市场与品牌优势快速实现创新转化,获得更高回报,因而在创新不确定性面前仍保持投入。

为了验证这一逻辑,在参考潘越等^[34]做法的基础上,本文将企业的营业收入位于地区-行业前10%的样本定义为行业领导者,其他则定义为跟随者。然后设置是否为行业领导者的虚拟变量 *Leader*,并与自变量 *BAM* 交乘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如表4列(1)~列(3)所示,交乘项 *BAM* × *Leader* 显著为正,这表明相比于追随者,行业的领导者在行政垄断规制之后具有更高的创新产出,这一结论与本文的预期相符。

3.4.2 企业产权性质差异

行政垄断指政府通过政策法规人为限制竞争的行为。国有企业因政治关联易获行政庇护与资源倾斜,常成为行政垄断受益者与实施主体;非国有企业则面临行政壁垒,承担更高制度性成本。行

政垄断规制的推进降低了市场壁垒,使非国有企业能在更公平环境中运营,减少非生产性支出,增加创新投入。同时,行政垄断规制削弱地方政府对资源的干预,推动资源由低效国企向高效非国企流动,激发后者的创新潜力。相对而言,国企资源原本充裕,行政垄断规制带来的边际改善有限,因此创新促进效应在非国企中更为显著。此外,从市场竞争角度看,非国企缺乏行政保护,对竞争更为敏感。行政垄断规制加剧市场竞争,倒逼非国有企业通过创新谋求发展;而国企受政治庇护,竞争反应相对迟缓,创新水平的提升也会更为有限。

为此,依据企业的注册类型,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设置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Soe*。然后通过加入交乘项 *BAM* × *Soe* 进行回归检验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产权性质差异。结果如表4列(4)~列(6)所示,交乘项 *BAM* × *Soe* 的回归系数均在10%的水平以上显著为负。这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规制更能够促进非国企的创新产出。

表 4 市场地位与产权性质异质性检验

Table 4 Heterogeneity test of market posi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nature

变量	市场地位差异			产权性质差异		
	(1)	(2)	(3)	(4)	(5)	(6)
	<i>Patent</i>	<i>Ipatent</i>	<i>Nipatent</i>	<i>Patent</i>	<i>Ipatent</i>	<i>Nipatent</i>
<i>BAM</i>	0.013 *** (9.491)	0.003 *** (3.852)	0.013 *** (10.721)	0.012 *** (9.066)	0.003 *** (3.426)	0.012 *** (10.339)
<i>BAM</i> × <i>Leader</i>	0.051 *** (15.815)	0.047 *** (22.975)	0.035 *** (12.060)			
<i>Leader</i>	0.037 *** (33.373)	0.026 *** (37.447)	0.028 *** (28.977)			
<i>BAM</i> × <i>Soe</i>				-0.026 *** (-5.332)	-0.006 * (-1.895)	-0.022 *** (-4.971)
<i>Soe</i>				-0.007 *** (-3.831)	-0.005 *** (-4.459)	-0.004 ** (-2.302)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Firm</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 <i>Ind</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3 257 665	3 257 665	3 257 665	3 257 665	3 257 665	3 257 665
<i>R</i> ²	0.644	0.628	0.612	0.644	0.615	0.612

3.4.3 地区司法透明度差异

中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明显的司法权力地方

化倾向,即地方司法系统在体制与资源上依附于地方政府^[35]。在这一背景下,司法透明度成为影

响行政垄断规制实际效果的重要制度因素。本文预期,司法透明度越高,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越显著,主要原因如下:1)司法透明度增强政策承诺的可信度。高透明度司法体系下,法律规则清晰、执行可预期,能够强化执法震慑效应,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激励企业增加对长期创新活动的投入;2)司法透明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高透明度司法体系能够高效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减少企业成果被侵权风险,提升其通过创新获取垄断租金的预期,进而促进创新投入;3)司法透明度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高透明度司法增强契约执行力,引导资源流向高效率创新主体;同时通过审判公开与法官问责压缩寻租空间,避免行政垄断规制后租金仅转移至关系垄断者,确保竞争回归创新导向。

为了验证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关系会受到地方司法透明度的影响,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发布的《中国司法透明度年度报告》整理了各个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透明度得分 (*LJP*),并通过与自变量 *BAM* 交乘进行分析。表 5 列(1)~列(3)报告了相关结果,由交乘项 $BAM \times LJP$ 显著为正可知,当地区的司法透明度较高时,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会更为明显,这符合本文

的推论。

3.4.4 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差异

行政垄断程度与地方市场条件紧密相关。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行政壁垒普遍存在,严重抑制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此时,行政垄断常被用作保护既得利益、限制竞争的手段。对其进行规制能够显著改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为确立新优势而加强技术、产品与管理创新,从而使行政垄断规制的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在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竞争环境相对成熟,行政垄断的抑制作用有限,企业创新更多受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等内在动力驱动。此时,规制的作用更多体现为清除残余行政壁垒,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激励相对有限。

因此,本文认为在地方市场分割程度本身就较高的地区,行政垄断规制将对地区的创新活动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借鉴盛斌和毛其淋^[36]的做法,采用 7 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测算了地级市层面的市场分割程度 (*MEG*),然后采用地级市的样本初始期的市场分割水平进行交乘分析。表 5 列(4)~列(6)为本部分的相关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变量 *MEG* 与 *BAM* 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表明在市场分割本身较高的地区,行政垄断规制的创新效应会更为明显。

表 5 司法透明度与市场分割异质性检验

Table 5 Test of judicial transparency and heterogeneity of market segmentation

变量	司法透明度差异			市场分割差异		
	(1)	(2)	(3)	(4)	(5)	(6)
	<i>Patent</i>	<i>Ipatent</i>	<i>Nipatent</i>	<i>Patent</i>	<i>Ipatent</i>	<i>Nipatent</i>
<i>BAM</i>	0.006 *** (3.150)	0.001 (0.762)	0.006 *** (3.444)	0.020 *** (13.532)	0.006 *** (6.367)	0.019 *** (13.824)
$BAM \times LJP$	0.052 *** (5.981)	0.022 *** (4.028)	0.049 *** (6.334)			
<i>LJP</i>	0.017 *** (6.516)	0.018 *** (11.335)	0.007 *** (3.021)			
$BAM \times MEG$				16.815 *** (10.080)	5.543 *** (5.447)	13.265 *** (8.897)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Firm</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times Ind$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3 257 665	3 257 665	3 257 665	3 069 896	3 069 896	3 069 896
<i>R</i> ²	0.644	0.615	0.612	0.644	0.616	0.612

4 扩展性研究

在验证了行政垄断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地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出清和创业的视角对行政垄断规制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

4.1 基于僵尸企业出清视角的分析

行政垄断通常被认为是催生僵尸企业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达成特定经济或社会目标,地方政府经常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信贷支持,维系本应退出市场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存。地方政府不当扶持形成的僵尸企业会扭曲资源配置,抑制市场竞争且挤出正常企业的投资,使部分企业依赖行政庇护、政企合谋与信贷倾斜得以存续,最终沦为僵尸企业^[37-39]。行政垄断规制则从源头上约束政府行为,减少其对市场资源的直接干预,

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行政垄断规制也有助于消除相关企业的隐性担保,震慑潜在垄断行为,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企业真实经营状况配置信贷,从而借助市场力量推动僵尸企业出清。因此,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恢复地区内正常的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秩序,降低僵尸企业所能获取的政策与金融支持,逐步实现市场化清退。

为验证上述机制,参照肖兴志等^[40]的研究,采用CHK方法识别僵尸企业。在此基础上,借鉴王永钦等^[41]的做法,以地级市各行业僵尸企业占比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僵尸企业相关的回归结果如表6列(1)所示,自变量BAM显著为负,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显著降低了地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结合前文的结果来看,司法层面的行政垄断规制对于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确实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提升,也促进了企业的去僵尸化。

表6 僵尸企业和创业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zombie enterprises and startups

变量	僵尸企业占比	创业水平	
	(1)	(2)	(3)
	<i>Zombie</i>	<i>Entrep_num</i>	<i>Entrep_per</i>
<i>BAM</i>	-0.017 *** (-4.489)	0.249 *** (14.091)	0.166 *** (5.784)
<i>Controls</i>	Yes	Yes	Yes
<i>City × Ind</i>	Yes	Yes	Yes
<i>Year × Ind</i>	Yes	Yes	Yes
<i>N</i>	114 662	251 426	251 426
<i>R</i> ²	0.376	0.592	0.646

4.2 基于地区创业的分析

公平的市场环境是影响企业家创业决策的关键因素^[42]。行政垄断规制在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中,也将深刻影响企业家的创业意愿。行政垄断通常表现为利用公共权力设置不合理定价、限定经营主体或指定交易对象等,以此限制公平竞争、阻碍新主体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失灵^[43]。

对创业者而言,预期的创业成本与收益至关重要。在行政垄断盛行的地区 and 行业,新创企业往往因政策歧视和既有垄断者的排挤而面临更高经营风险与更低存活率。行政垄断不仅直接限制创

业活动,还通过压低预期收益与抬高制度性成本,削弱地区创业活力。而行政垄断规制通过清除不合理的政策壁垒与垄断势力,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使创业者能够获得合理的预期回报^[44],进而激发企业家精神。因此,本文预期行政垄断规制在促进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将提升地区新创企业数量,增强区域创业活力。

为验证这一逻辑,本文使用2007年—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97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的企业工商登记数据,在城市-行业-年份维度统计新创企业数量,构建地区-行业层面的新创企业数量

Entrep_num (千家) 和人均新创企业数量 *Entrep_per* (家/万人) 度量创业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表6的列(2)和列(3)报告了行政垄断规制对创业水平回归的实证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以新创企业数量 *Entrep_num* 还是人均新创企业数量 *Entrep_per* 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行政垄断规制变量 *BAM* 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的创业水平,符合本文的预期。

5 结束语

本文以中国2007年—2016年税收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行政垄断规制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体现在对于行政垄断案件的执法实践有助于提升当地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之后依然存在;2)机制检验发现,行政垄断规制主要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两条机制促进企业创新;3)异质性分析表明,行政垄断规制的创新促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其市场领导者、非国有企业、司法透明度较高以及市场分割程度较严重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4)扩展性分析进一步发现,行政垄断执法不仅激发企业创新,还有助于推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并提升地区创业活力,反映出其对经济活力的综合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1)为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持续强化法治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关键作用。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已通过扫黑除恶、知识产权保护、破产制度改革与反垄断执法等一系列法治实践,显著提升了市场制度的完备性与执行力。本文研究亦表明,依法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应继续依托法治的规范力与约束力,营造更具吸引力与竞争力的营商环境;2)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路径。本文发现,行政垄断规制主要通过优化市场环境、抑制寻租与强化竞争等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有效分摊企业研发与服务成本,形成规模经济优势,但当前仍面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等制度性障碍。为此,应坚持“破立结合”:一方面破除各类形式的地方壁垒,清理歧视性政策与不合理补贴,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另一方面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构建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企业提升技术与产品竞争力;3)在推进规制行政垄断与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需重视地区与企业间的差异性。我国部分区域仍存在国企比重高、市场化程度低、司法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结合地区市场发育水平、制度环境与企业特征实施精准施策。对市场分割严重、司法透明度较低的地区,应通过针对性制度改革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增强治理举措的精确性与实效性。

参考文献:

- [1] 刘永红, 唐 洋.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破解行政垄断的法治之道[J]. 长白学刊, 2023, (1): 78-87.
Liu Yonghong, Tang Yang. Breaking 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s path to rule of la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onstruction[J]. Changbai Journal, 2023, (1): 78-87. (in Chinese)
- [2] 韩 剑, 郑秋玲. 政府干预如何导致地区资源错配——基于行业内和行业间错配的分解[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 (11): 69-81.
Han Jian, Zheng Qiuling. How doe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lead to resource misallocation: Based on decomposition of misalloc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industrie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 (11): 69-81. (in Chinese)
- [3] 张 伟, 于良春. 行业行政垄断的形成及治理机制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 (1): 69-78.
Zhang Wei, Yu Liangchun.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J]. China Indus-

- trial Economics, 2011, (1): 69–78. (in Chinese)
- [4] Lichand G, Soares R R. Access to justice and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Brazil's special civiltribunals[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4, 57(2): 459–499.
- [5] Melitz M J, Ottaviano G I P.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1): 295–316.
- [6] 蔡庆丰, 陈熠辉, 林海涵. 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创新: 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对比研究[J]. 金融研究, 2021, (5): 153–170.
- Cai Qingfeng, Chen Yihui, Lin Haihan. Development zone and firm innovation: Excitation or extrusion?: Evidence from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development zon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21, (5): 153–170. (in Chinese)
- [7] 陈熠辉, 蔡庆丰, 林海涵.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会提升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动吗? ——基于“撤县设区”的实证发现与政策思考[J]. 经济学(季刊), 2022, 22(2): 465–484.
- Chen Yihui, Cai Qingfeng, Lin Haihan. Government-driven urbaniza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ity: County merger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2, 22(2): 465–484. (in Chinese)
- [8] 金 碚.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4): 5–18.
- Jin Bei. An economic stud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8, (4): 5–18. (in Chinese)
- [9] Aghion P, Bloom N, Blundell R, et 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2): 701–728.
- [10] 谢 露, 刘秀梅, 谭有超. “倒逼”还是抑制? 国际贸易摩擦与企业创新[J]. 管理科学学报, 2025, 28(4): 17–31.
- Xie Lu, Liu Xiumei, Tan Youchao. Reverse push effect or suppression e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5, 28(4): 17–31. (in Chinese)
- [11] Hsu P H, Tian X, Xu 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ross-country evide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4, 112(1): 116–135.
- [12] Impullitti G, Licandro O. Trade, firm selection and innovation: The competition channel[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8, 128(608): 189–229.
- [13] 杨兴全, 张可欣.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促进企业创新? ——基于规制行政垄断的视角[J]. 财经研究, 2023, 49(1): 63–78.
- Yang Xingquan, Zhang Kexin. Can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ulating administrative monopoly[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3, 49(1): 63–78. (in Chinese)
- [14] 张 杰, 郑文平, 新 夫. 中国的银行管制放松、结构性竞争和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10): 118–136.
- Zhang Jie, Zheng Wenping, Xin Fu. Bank deregulation, structural competition and enterprises' innovation in China[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7, (10): 118–136. (in Chinese)
- [15] 佟家栋, 范龙飞.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价值链网络深化升级[J]. 经济学动态, 2022, (2): 18–34.
- Tong Jiadong, Fan Longfei.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deepening upgrading of domestic value chain networks[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2, (2): 18–34. (in Chinese)
- [16] 张 杰, 周晓艳, 李 勇.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 R&D? [J]. 经济研究, 2011, 46(8): 78–91.
- Zhang Jie, Zhou Xiaoyan, Li Yong. Doe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barrage Chinese firms' R&D?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 46(8): 78–91. (in Chinese)
- [17] 张 杰, 郑文平. 创新追赶战略抑制了中国专利质量么? [J]. 经济研究, 2018, 53(5): 28–41.
- Zhang Jie, Zheng Wenping. Has catch-up strategy of innovation inhibited the quality of China's patents?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8, 53(5): 28–41. (in Chinese)

- [18] Howell S T. Financing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R&D gran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4): 1136–1164.
- [19] Krueger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64(3): 291–303.
- [20] Deng L, Jiang P, Li S, et 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firm investment[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0, (63): 101231.
- [21] 叶光亮, 程 龙, 张 晖. 竞争政策强化及产业政策转型影响市场效率的机理研究——兼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1): 74–92.
Ye Guangliang, Cheng Long, Zhang Hui. Impacts of strengthening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 transformation on market efficiency: The analysis of the efficient market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2, (1): 74–92. (in Chinese)
- [22] 于良春, 付 强. 地区行政垄断与区域产业同构互动关系分析——基于省际的面板数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 (6): 56–66.
Yu Liangchun, Fu Qiang. Study on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panel data between province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8, (6): 56–66. (in Chinese)
- [23] Zhong W, Zheng Y. Do political connections stifle firm innovation? Natur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5, 46(5): 1183–1216.
- [24] 范子英, 王 倩. 财政补贴的低效率之谜: 税收超收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12): 23–41.
Fan Ziyang, Wang Qian. The inefficiency of governmental subsidies: Perspective of tax over-collection[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9, (12): 23–41. (in Chinese)
- [25] 黎文靖, 郑曼妮.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6, 51(4): 60–73.
Li Wenjing, Zheng Manni. Is it substantive innovation or strategic innovation?: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on micro-enterprises' innova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6, 51(4): 60–73. (in Chinese)
- [26] 陈熠辉, 李东旭, 陈一笛. 零工经济渗透与企业创新——来自外卖和网约车平台进入的经验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5, 42(7): 88–109.
Chen Yihui, Li Dongxu, Chen Yidi. Gig Economy penetra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ntry of food delivery and ride-hailing platforms[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5, 42(7): 88–109. (in Chinese)
- [27] 权小锋, 尹洪英. 中国式卖空机制与公司创新——基于融资融券分步扩容的自然实验[J]. 管理世界, 2017, (1): 128–144, 187–188.
Quan Xiaofeng, Yin Hongying. Chinese short selling mechanism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A natural experiment from Chinese margin trading program[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7, (1): 128–144, 187–188. (in Chinese)
- [28] 谢贞发, 杨健鹏, 梅思雨. 从隶属走向共享: 财政利益、统一大市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2): 26–46.
Xie Zhenfa, Yang Jianpeng, Mei Siyu. From affiliation to sharing: Fiscal benefits, unified marke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24, 41(2): 26–46. (in Chinese)
- [29] 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 11(2): 159–189.
- [30] 周煜皓, 张盛勇. 金融错配、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J]. 会计研究, 2014, (8): 75–80, 97.
Zhou Yuhao, Zhang Shengyong. Financial misallocation, asset specificity and capital structure[J]. Accounting Research, 2014, (8): 75–80, 97. (in Chinese)
- [31] 张跃军, 刘文丽. 政府补贴如何促进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 [J]. 管理科学学报, 2025, 28(2): 1–14.
Zhang Yuejun, Liu Wenli. How can government subsidies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new energy enterpris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5, 28(2): 1–14. (in Chinese)

- [32] 于 博, 王云芳. 政策性负担、企业寻租与创新挤出[J]. 软科学, 2022, 36(10): 17–25.
Yu Bo, Wang Yunfang. Policy burden, rent: Seeking and innovation extrusion[J]. Soft Science, 2022, 36(10): 17–25. (in Chinese)
- [33] 王永进, 冯 笑.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2): 24–42.
Wang Yongjin, Feng Xiao.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on approval system and firms' innovation[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8, (2): 24–42. (in Chinese)
- [34] 潘 越, 潘健平, 戴亦一. 专利侵权诉讼与企业创新[J]. 金融研究, 2016, (8): 191–206.
Pan Yue, Pan Jianping, Dai Yiyi. Patent litigation and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6, (8): 191–206. (in Chinese)
- [35] 潘 越, 潘健平, 戴亦一. 公司诉讼风险、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J]. 经济研究, 2015, 50(3): 131–145.
Pan Yue, Pan Jianping, Dai Yiyi. Litigation risk, judicial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innova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5, 50(3): 131–145. (in Chinese)
- [36] 盛 斌, 毛其淋.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 1985~2008 年[J]. 世界经济, 2011, (11): 44–66.
Sheng Bin, Mao Qilin. Trade openness,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and inter-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1985–2008[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1, (11): 44–66. (in Chinese)
- [37] 申广军. 比较优势与僵尸企业: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16, (12): 13–24, 187.
Shen Guangju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zombie firms: A study based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6, (12): 13–24, 187. (in Chinese)
- [38] 游家兴, 魏珊珊. 地方政府施政风格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僵尸企业的研究视角[J]. 管理科学学报, 2024, 27(1): 75–95.
You Jiaxing, Wei Shanshan. Loc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style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zombie fir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4, 27(1): 75–95. (in Chinese)
- [39] 李旭超, 赵 婧, 张 璇. 僵尸企业的产业链效应与民间投资挤出[J]. 管理科学学报, 2024, 27(7): 142–158.
Li Xuchao, Zhao Jing, Zhang Xuan. The industrial chain effect of zombie firms and private investment crowding[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24, 27(7): 142–158. (in Chinese)
- [40] 肖兴志, 张伟广, 朝 镛. 僵尸企业与就业增长: 保护还是排挤? [J]. 管理世界, 2019, 35(8): 69–83.
Xiao Xingzhi, Zhang Weiguang, Chao Yong. Zombie firms and employment growth: Protection or displacemen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8): 69–83. (in Chinese)
- [41] 王永钦, 李 蔚, 戴 芸.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了企业创新?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8, 53(11): 99–114.
Wang Yongqin, Li Wei, Dai Yun. How do zombie firms affect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firm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8, 53(11): 99–114. (in Chinese)
- [42] 刘 慧, 綦建红. “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更有利于企业投资效率提升吗? ——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 财贸经济, 2022, 43(9): 101–116.
Liu Hui, Qi Jianhong. Is “Competitive-Friendly” industrial policy mo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firms' investment efficienc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J].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22, 43(9): 101–116. (in Chinese)
- [43] 刘志彪, 孔令池. 从分割走向整合: 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8): 20–36.
Liu Zhibiao, Kong Lingchi. From se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 The resistance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1, (8): 20–36. (in Chinese)
- [44] 张洪胜, 谢月星, 杨高举, 等.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福利效应研究[J]. 管理世界, 2025, 41(1): 15–40.

Zhang Hongsheng, Xie Yuexing, Yang Gaoju, et al. Research on the welfare effects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5, 41(1): 15–40.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egulation, unified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enforcement cases

*CHEN Yi-hui*¹, *WEI Hao-yuan*², *CAI Qing-feng*³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2. HSBC Business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1, China

Abstract: Dismantling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serves as a foundational support for establish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rinsic logic linking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egulation,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relevant enforcement cases and Chinese tax survey data spanning 2007 to 2016.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egulation through enforcement practic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rporat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egulation primarily facilitates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onstruction by strengthening market competition and opt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reby advanc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egulatio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for samples comprising industry leaders, non-state-owned corporations, and corporations in regions with higher judicial transparency and greater initial market segmenta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egulation aids in clearing out zombie corporates and stimulating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is research holds signific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standard market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regulation; corporate innovation; competition effect; rent-seeking control; resource allocation